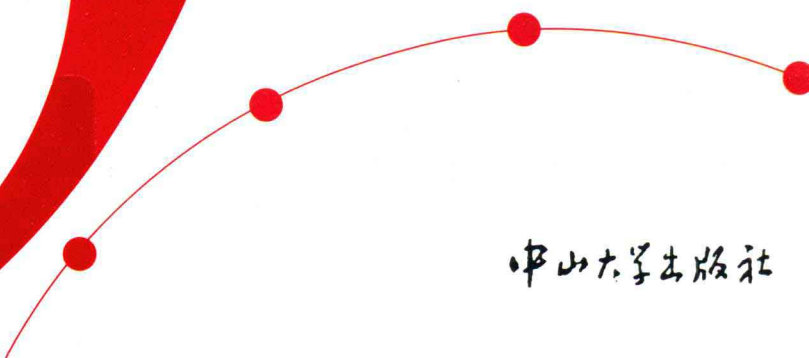


A large, bold, red abstract graphic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cover, resembling a stylized 'S' or a curved arrow. It starts from the top left, curves down and to the right, then curves back up and to the left, ending near the bottom left. The graphic is composed of two main curved segments.

转型时期 我国政治整合问题研究

王志勇 著

Zhuanxing Shiqi
Woguo Zhengzhi
Zhenghe Wenti Yanjiu

A thin red arc with four red dots, starting from the bottom left and curving towards the bottom right.

中山大学出版社

转型时期我国政治 整合问题研究

王志勇 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 广州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转型时期我国政治整合问题研究/王志勇著.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2. 8

ISBN 978 - 7 - 306 - 04214 - 9

I. ①转… II. ①王… III. ①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中国
IV. ①D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52535 号

出 版 人: 祁 军

策划编辑: 徐镜昌

责任编辑: 徐镜昌

封面设计: 林绵华

责任校对: 杨文泉

责任技编: 何雅涛

出版发行: 中山大学出版社

电 话: 编辑部 020 - 84111996, 84113349, 84111997, 84110779

发行部 020 - 84111998, 84111981, 84111160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 编: 510275

传 真: 020 - 84036565

网 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ebs@mail.sysu.edu.cn

印 刷 者: 广州中大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880mm × 1230mm 1/32 10.75 印张 268 千字

版次印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册 定 价: 23.00 元

如发现本书因印装质量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转型为背景，着重探讨了在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政治整合问题。本书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在于，它不仅运用了众多的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的经典理论资源和概念工具对处于转型期中国社会在政治、文化和经济生态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新的特征作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实证剖析和透视，而且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的政治整合机制也作了较为系统和客观的梳理和评析。

本书认为，中国现在有的政治整合机制是在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社会调控模式的基础之上为适应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现实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总体而言，它适应了中国现实社会的发展，但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由此带来的中国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诸多方面所凸现出不来的新特征的不断显现，中国现实的政治整合机制也存在诸多内在的不足。它需要不断地完善和丰富。在此基础上，本书对如何完善转型期中国政治整合机制作了一系列的有益的探讨。

前 言

本书是在我三年前答辩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2006年至2009年间，我在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攻读政治学理论方向的博士学位，有幸成为国内政治学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张永桃教授的门生。三年读博期间，在张先生的精心指导下，我较为系统地研究和探讨了转型时期我国政治整合问题。现在呈现在各位尊敬的读者面前的就是我在张先生指导下研究转型时期我国政治整合问题的阶段性成果。

国内有关政治整合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前国内学术界有关政治整合问题的研究尽管已达20多年，但总体而言，研究还相当不够。系统研究这一方面的专著还较为稀少，尤其是直接以“转型期我国政治整合问题”为主题的研究成果更为欠缺，已有的一些研究也往往是偏重于历史性的、描述性的研究，而缺乏较为系统和深入的理论剖析。因此，本书所涉及的“转型期我国政治整合问题研究”更多地带有抛砖引玉的性质。

本书有关“转型期我国政治整合问题的研究”，主要由三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主要系统地梳理和探讨了我国进入社会转型期以后，在文化、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四大领域所呈现出来的一系列的有别于传统计划经济时期的新的社会生态和特征。本书认为，中国经过30多年的社会转型，在主流的文化和价值取向方面，

已经从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泛政治化的社会逐步转向讲求实际的世俗化社会；在经济领域已经由单一的公有制为主导的计划经济社会初步转变成为多种所有制并存、以市场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在社会成员公共交往模式上，已从彼此相互熟悉的熟人社会逐步转变成为以匿名化为主导的陌生人社会；在国家的宏观政治领域，本书强调了转型期中国政治出现的三个新的特征：①与传统社会民众政治参与主要表现为动员型政治参与模式不同，转型期中国民众主动型政治参与的现象日趋明显；②转型时期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曾经拥有的传统政治整合资源流失严重；③在转型时期国外的政治主体直接参与和进入我国现实政治过程的现象也日益显现。

第二部分，结合翔实的史料和相关的文本分析，较为详细地探讨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政治整合机制的变迁。本书认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治整合机制的变迁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计划经济时期和社会转型时期。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社会的政治整合机制主要表现为：以中国共产党为主体和核心，在自上而下的科层压力推动下所形成的以政治性群众运动和强制性意识灌输行为作为主要方式与路径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关于转型期中国政治整合机制，本书认为它一个最为突出的特征是：抛弃了在计划经济时期把政治性群众运动和强制性意识形态灌输作为国家政治整合的基本方式和路径的做法，代之以在科层压力推动下的、通过面向市场化的经济改革使民众在国家经济发展中不断得到实惠的做法，以此作为国家从政治上整合社会的主要模式和路径。

第三部分，着重探讨和深入地剖析了转型期我国政治整合机制中内在的种种不足，并对如何完善当前我国的政治整合机制提出了一系列的对策性思考和建议。

需要指出的一点是，由于时间仓促，除了极个别字句和标题

作了少许的变动以外，本书基本上保持了 my 博士论文的原貌。之所以如此，在这里说明一下，虽然说我博士毕业已达三年，但由于我博士毕业后接着又从事了近两年的博士后研究工作，在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期间我遵从合作导师的建议，主要侧重于研究城市化问题，因此用于对博士论文中的内容作进一步探讨的时间很少。博士后出站这一年来，进入新的工作单位，对新的工作单位又有一个熟悉的过程，也抽不出时间对原有的论文再作更深入的研究。我深知学无止境，对转型期中国政治整合问题的研究也是无止境的。本书中的肤浅和不当之处还请诸位读者、学界前辈和同仁多多批评指正！

最后，在本书出版之际，我要向我的博士生导师张永桃教授表示最诚挚的感谢！我还要感谢在南京大学读博期间给予我知识和教诲的张凤阳教授、闫小波教授、严强教授、王云骏教授、黄健荣教授，感谢在我博士论文评阅和答辩期间给予我指导和帮助的江苏省委党校汪锡奎教授、南京师范大学王跃教授，感谢我在南京大学读博期间所有帮助和关心我的热心人。

本书能够出版，我还要特别感谢中山大学出版社徐镜昌老师，感谢他为本书的出版所付出的心血；同时我还要感谢中山大学出版社为本书的出版付出艰辛劳动的所有的领导和工作人员；此外，我还要感谢我现在所在的单位广东商学院政治与教育学院关心和帮助我的所有领导、同事和朋友们！

王 志 勇

2012 年 6 月

目 录

第一章 导 论	1
第一节 问题的缘起与提出.....	1
一、转型期以来我国社会政治生态发生的重大变迁.....	2
二、转型期中国政治生态变迁要求 改革现有的政治整合模式	10
第二节 学术界目前在政治整合问题上的研究现状	14
一、国外的研究动态	14
二、国内研究动态	17
第三节 本书研究方法与创新	23
一、研究方法	23
二、研究方法的可行性说明	23
三、创新之处	24
第二章 核心概念界定和相关代表性理论概述	25
第一节 核心概念“整合”与“政治整合”界定	25
一、“整合”的界定	25
二、“政治整合”的界定	30
第二节 有关政治整合问题的代表性理论概述	33
一、西方学者有关政治整合问题的代表性理论	34
二、中国先人与政治整合相关的代表性理论	39

第三章 转型期我国政治整合所面临的新的社会生态	44
第一节 世俗化：转型时期我国社会	
基本的文化和价值取向	45
一、转型时期我国社会的基本价值和	
文化取向逐步世俗化的表现	51
二、转型时期我国社会的基本价值和	
文化取向逐步世俗化的原因	60
第二节 所有制形式多样化，市场在社会资源	
配置中的主导地位初步形成	70
一、我国已初步形成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所有制格局	73
二、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主导地位	
在我国社会中已初步形成	77
第三节 异质性匿名化的陌生人社会的初步形成	79
一、我国初步成为异质性匿名化的	
陌生人社会的主要表现	84
二、我国初步成为异质性匿名化的	
陌生人社会的原因	91
第四章 转型期我国政治整合所面临的新的政治生态	99
第一节 民众主动型政治参与现象日趋明显	99
一、我国民众主动型政治参与现象	
日趋明显的主要表现	102
二、民众主动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现象	
日趋活跃的原因	116
第二节 国家政治整合的传统资源流失严重	128
一、部分民众与党和政府相疏离的情结	128
二、党和政府整合社会的传统组织资源流失严重	134
三、中央机构对地方组织	

的制约力有所弱化·····	146
第三节 外部因素直接进入我国政治过程的现象日益显现·····	164
一、国际机制已进入我国的政治生活	
直接影响国家的政府过程·····	164
二、国外组织和机构直接影响我国政府决策的现象显现·····	170
三、国际机制和国外组织与机构直接进入我国政府过程的原因探析·····	176
第五章 转型时期我国的政治整合机制·····	188
第一节 我国政治整合机制的由来：	
转型前我国的政治整合机制·····	188
一、中国共产党是我国政治整合的主体和核心·····	189
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和政策是我国政治整合的基本依据和规范·····	200
三、科层压力推动下的群众运动和思想灌输行为是政治整合的基本方式和路径·····	208
第二节 我国政治整合机制的现状：	
关于其内涵的完整论述·····	225
一、转型期我国政治整合机制沿袭了转型前机制中的一些基本原则·····	226
二、转型时期我国政治整合机制的新特点·····	234
第六章 转型时期我国政治整合机制内在的不足·····	246
第一节 政治整合机制所依赖的组织载体内在的不足·····	246
一、我国政治整合机制中	
存在组织载体不足·····	246

二、用走回头路的方式来解决政治整合机制中 组织载体不足问题行不通·····	248
三、当前所进行的制度创新难以弥补政治整合 机制中组织载体内在的不足·····	251
第二节 政治整合机制所依赖的 规范和内容内在的不足·····	255
一、我国现实的决策模式难以充分 满足民众政治参与欲望·····	258
二、我国政策输出难以充分满足 民众对利益诉求的期盼·····	260
三、我国决策模式和政策输出不能充分 满足民众需要不利于社会和谐·····	265
第三节 政治整合机制中所采用的 基本路径和推力内含的不足·····	269
一、面向市场经济的政治整合路径潜藏着 社会结构与文化期待相脱节的冲撞·····	269
二、面向市场经济的政治整合路径 面临着市场体制内在缺陷的侵扰·····	273
三、以科层压力作为政治整合的推力 在转型时期日益显现其局限性·····	276
第七章 完善转型时期我国政治整合机制的若干思考·····	282
第一节 扩大干部录用机制的开放度·····	282
一、扩大干部录用机制的开放度能增强 我国政治整合机制中组织载体涵盖度·····	283
二、有关扩大干部录用机制的开放度的具体设想·····	286
第二节 构建中央对地方干部的 常态化再社会化培训机制·····	289

一、构建中央对地方干部的常态性	
培训机制可以增强党的政策效能·····	290
二、构建中央对地方干部的常态性	
培训机制的简单设想·····	295
第三节 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国家的决策体系·····	297
一、在决策理念中进一步把人民	
当家作主的观念落到实处·····	299
二、明确中央和地方机构的决策边界，	
适当减少决策层次·····	301
三、强化决策体系的公开性和透明性·····	304
第四节 开辟新的政治整合资源和途径·····	307
一、强化在国家政治生活的制度层面	
和操作层面对形式正义的尊重·····	307
二、党在制定政策时应体现和贯彻正义的差别原则·····	310
 参考文献·····	 314
一、学术论著和文献资料·····	314
二、学术论文·····	328

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问题的缘起与提出

肇始于 20 世纪 70 代末的中国社会转型，迄今止已近 30 余年。30 余年来我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所有制方面，转型前以公有制为唯一所有制形式的格局已被打破，虽然在现阶段，公有制在我国所有制中还占主体地位，但是，以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和个体经营为代表的非公有制形式在我国社会经济领域已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甚至在某些地方其所占有的比例已超过公有制的份额。在经济管理方面，转型前以强制性的指令计划和行政命令为主要手段的经济管理模式，尽管在现实社会中的某些局部、某些环节还留下了明显的痕迹，但总的来说，以市场为导向、以追求利润为动力的市场经济管理体制已在我国社会初步建立。在社会生活领域，转型前把我国社会切割成近乎于相互隔离的“城乡二元化”格局和把一般的民众分割成为城市的“单位人”、乡村的“集体人”的“单位制”与“人民公社制”的制度安排在社会转型的冲击下已近解体。就前者而言，“户籍制”作为现存的当年构建“城乡二元化”格局最后的一项制度安排，虽然在少数特大城市目前还在履行着“守门者”的角色，但是在其他的大中小城市中，其“守门者”的角色已被大大弱化，甚至在一些中小城市 and 市镇基本消失，就是在前面所提到的

少数特大城市中其履行“守门者”职责的刚性也被大大的软化。在思想文化领域，转型前我国社会民众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高度一体化与同质化的现象也被打破，在主流的社会意识和价值观之外，人们思想文化观念和价值体系多元化、异质化的趋向日益明显。

转型期以来我国社会所发生上述种种的变化，不可避免地会反映到政治层面。

一、转型期以来我国社会政治生态发生的重大变迁

转型以来我国社会政治生态发生了重大的变迁，具体说其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 国家政治权威的刚性被严重地侵蚀。转型前的我国社会，国家是唯一的社会权威资源和物质资源的拥有者与供给者，任何一个民众如果不服从国家政治权威组织对其社会地位的认定和安排，他将面临难以克服的生存危机。因为他只有从政权体系那里才能获得生存的物质资源和社会资源，除此以外别无来源。在这种巨大的生存压力下，他若固守自己的不服从的态度，轻则生活质量将大打折扣，重则将失去生存的空间。正因为如此，当年斯大林的政敌托洛茨基曾把这种现象概括为“不服从者不得食”^①的原则。当然，提出这种观点的人对当时的社会主义苏联带有极端仇视和个人偏见，但抛开个人的感情因素，客观上说，这种观点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计划经济时代社会的现实。关于这一点，一位旅日的华人学者也提出了类似的见解，他认为，在过去，“当部下的言行引起上司不满时，他所面临的选择是改变自

^①（俄）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转引萨托利《民主新论》，上海：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406页。

己的个性按照上司指示行事，否则就有可能遭到各种处分”。^①这一表述尽管没有前者那么直白，但同样表明在计划经济时代对政治权威服从的绝对性。在这种“不服从者不得食”的潜规则之下，不管是出于对生存的渴望，还是出于个人的理性认知，除极个别的成员以外，一般来说人们都会选择对政权系统表示绝对的服从。在这种绝对服从的氛围下，政权体系权威的刚性也就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1978年，我国社会自上而下启动了社会转型进程，由此我国社会资源控制模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尽管从现实的角度看，国家和政府仍然是社会权威资源和物质资源的最大的、也是最主要的拥有者和供给者，但是30余年以来民间社会拥有的物质资源和权威资源也极为可观，而且目前还在以令人震惊的速度不断地扩大。这种现象的存在，势必会导致以下两种情况：

(1) 对于那些不满足于或不满意国家权威系统对个人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安排的系统内部的个体而言，他可以不像在社会转型以前那样只有通过改变自己的态度、绝对服从组织的安排才能维持和保证自己现有的生活待遇和社会地位。当然，现在他仍然可以如此，但现在他至少还有一种选择：他可以在固守个人态度的前提下通过到政权体系以外的社会权威体系中寻找资源而保持乃至进一步地扩大自己现有的一切。

(2) 对于众多的处于权力系统之外的民众而言，由于在现有的政治体系之外存在庞大的社会资源，他们中的极大一部分的成员完全可以在国家权力体系不直接“在场”的情况下，或者说他们可以在国家权力系统“缺席”的氛围中，获得自己所需要的社会资源。进一步地说，在他们日常谋生的经历中感受到的

^① 唐亮：《渐进·民主——变革中的中国政治》，新加坡：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4年版，第84页。

是那些民间的社会资源拥有者的权威，体验不到国家的权威，自然国家在他们心目中的权威也就相应地被弱化。由此，转型前国家权力系统在人们心目中权威的刚性也就被大大地弱化和侵蚀。

2. 国家权力系统所拥有的组织资源严重萎缩。转型前我国是一个组织极为严密、国家控制程度极高的政治实体。国家政权系统依靠从中央、省（直辖市、自治区）、市（地）、县（区）到农村地区的公社、大队、小队和城镇区域的区、街道办事处、街道居委会以及各种各样级别、各种各样形式的单位等一系列的组织网络，使国家政权的影响力，或者通俗一点说国家政权的触角深入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当时，我国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在一定组织中的人，社会中的每一个组织都肩负着特定的政治职能，都是政治中的组织。毫不夸张地说，当时中国的民众每一个人都是“组织人”，都是“政治人”，国家权力系统所拥有的组织资源涵盖了社会所有的领域，用一句社会学术语来说，国家权力系统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场”。因此，当时国家权力对社会的政治整合是极其高效的。不过，当时的这种高效性是以牺牲社会的自主空间、扼杀和限制民众自主精神和创新精神、使社会发展的动力严重不足、国家在世界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的竞争中越来越处于不利的地位等一系列不良后果为代价的。客观地说，当年如果没有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国家最高领导层即时地启动我国社会转型的进程，而继续按照原有的模式发展下去，其结局如何，那将是不可想象的！

我国社会开始转型以后，上述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已逐步为激发民众的创新精神、展拓社会自主空间、激励国家创新动力和增强国家在世界的科技竞争和经济竞争中优势地位的制度安排所代替和校正，由此我国社会又重新焕发出了勃勃生机和活力。但是，这些制度安排在给我国带来新生和活力的同时，也使国家政权系统维持国家一体化的组织资源与转型前相比大为萎缩。在农

村地区，作为国家政权系统延伸到农村地区的权力末梢——村社组织（在转型前称为生产大队、生产小队，转型以后称为村、村民小组）在转型启动后其所发挥的政治整合功能近乎虚置，因为，随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原有的人民公社集体体制的替代，这些末端组织再也不像转型前那样，作为国家权力系统的象征和权力的“眼睛”，通过直接组织和管理农村公民的生产活动乃至日常生活，在农村居民的生存体验中时时“在场”。在此之后，它们有限的“在场”机会，在农业税免除之前主要表现在其收取农村居民的“三提五统”、各种税费和督促计划生育工作等场合，而且这些工作往往又涉及农民个体与这些末梢组织之间的利益纷争。农业税免除以后，尽管农民个体与这些末端组织的利益紧张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但其作为国家政权组织体系延伸的末梢，在农村居民的生存体验中“在场”机会更是有限。况且在当今的中国农村，据美籍华裔学者张五常的观点，有近乎70%以上的劳动力流入了城镇^①，不过这一数字遭到了国内众多学者的质疑，但就是国内学者他们也不否认在当今中国的农村有近50%以上的劳动力流入了城市。^②这样一来，村社组织在农村中维持国家政治一体化的功能也就更进一步地被虚置，国家在农村地区维持国家政治整合的组织资源自然而然地也就大大萎缩。在城市地区，转型以前，作为国家政治系统履行政治整合职能的最主要的制度安排之一——“单位制”，自我国社会转型以来，尽管其在城镇地区事业性的单位中仍然留有极其明显的痕迹，但是在以生产经营为主旨的企业单位，随着在社会制度设置中

① 张五常，张维迎，盛洪等：《市场化三十年》，载《南方周末》，2008年9月11日，E-30。

② 张五常，张维迎，盛洪等：《市场化三十年》，载《南方周末》，2008年9月11日，E-32。